

李裕民的山西地方志研究

刘益龄

提 要：李裕民是国内著名宋史学者，在山西任教期间，致力于山西古方志辑佚、旧志研究与整理、新方志编修研究与指导，为山西地方志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对李裕民山西地方志研究的学术成就进行梳理和研究，以期学术界能有所了解，方志界能从中获得借鉴和启迪。

关键词：李裕民 山西古方志辑佚 旧志整理 新方志评议

李裕民，1940年3月生，浙江崇德人，中国著名宋史学者。1959年，李裕民进入杭州大学历史系学习，受业于徐规教授；1963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师从邓广铭教授攻读宋史；1968年7月，分配到山西大学历史系工作，1986年晋升为教授；1996年调到陕西师范大学，成为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裕民先生学识渊博、治学精严、著述宏富，除精通宋史之外，还兼涉古文字学、文献学、考古学，以及地方史志等诸多领域。目前已出版《宋史新探》①、《宋史考论》②、《宋人生卒行年考》③、《北汉简史》④、《四库提要订误》⑤等30余种著作，发表论文300余篇。

李裕民在山西工作长达28年。在山西大学历史系任教期间，他勤奋执著、潜心学问，很早就在教学与研究上崭露头角，成为该系的学术栋梁。他曾担任山西大学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山西高校古籍整理小组组长、《山西文史资料》主编、《北朝研究》主编、山西地方志特约编审等学术职务。尽管地方志不是他的主攻学业，但他凭借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功力，以及真挚的方志情怀，在山西地方志领域取得很高学术成就，包括旧志辑佚、旧志整理与研究、指导新志编修与新方志评论3个方面。其主要成果中，辑佚类著作有《山西古方志辑佚》⑥、《晋志钩沉》⑦；文献提要类有《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⑧（山西卷主编）、《山西文献总目提要》⑨（副主编）；旧志整理类有明成化《山西通志》⑩（总点校）、明万历《汾州府志》⑪、清《宁乡县志》等14种；旧志研究类学术论文9篇；新志研究与评论类近20篇。

一 古方志辑佚

李裕民先生十分珍视古方志，并对其价值有深刻认识。他认为：“早期志书多记地理，以后

① 参见李裕民：《宋史新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② 参见李裕民：《宋史考论》，科学出版社，2009年。

③ 参见李裕民：《宋人生卒行年考》，中华书局，2010年。

④ 参见李裕民：《北汉简史》，三晋出版社，2010年。

⑤ 参见李裕民：《四库提要订误（增订本）》，中华书局，2005年。

⑥ 参见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5年内部印刷。

⑦ 参见李裕民：《晋志钩沉》，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90年内部印刷。

⑧ 参见金恩辉、胡述兆主编：《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台湾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

⑨ 参见刘纬毅主编：《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山西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⑩ 参见李侃、胡谥纂修，山西省史志研究院：明成化《山西通志》点校本，中华书局，1998年。

⑪ 参见王道一修，孙和相纂修，李裕民、马夏民点校：明万历《汾州府志》点校本，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内容愈来愈丰富,几乎成了地方性百科全书,它包括了地理、历史、文学、天文、医学、生物、经济等各种学科,是研究我国古代科学文化不可少的资料。”^①他不仅对古方辑佚十分看重,而且有着宏大的古志辑佚抱负,曾说:“十几年来,我一直注意搜集古地志资料,想编一部《古地志辑佚全书》,全国性的总志为一编,地区性的按省分别成编。”^②他十几年锲而不舍,翻检历代正史、类书、旧志、文集等数百种,搜罗抉剔,精心采辑,终究得偿所愿,先后辑成《山西古方志辑》和《晋志钩沉》。

(一)《山西古方志辑佚》

此书分9卷,共收佚志236种,约40万字,是山西旧志辑佚集大成之作。其主要学术特点和价值有以下几个方面:

1. 采辑史料极具价值。佚文涉及建置沿革、四至八到、城池、坊乡、山川、风俗、户口、田赋、物产、公署、学校、祠庙、寺观、古迹、官制、人物、艺文、掌故等许多方面,对于研究当地历史、了解旧志演变、编纂新方志均有重要参考价值。如据《太平御览》《永乐大典》等所辑唐《晋阳事迹杂记》,详细记载了城池城门、名人宅邸、公署官衙等情况,是研究考察唐代太原城的规模、布局、功能、建筑分布的重要史料。^③又如《上党记》佚文中:“屯留有鱼子陂,多鱼蒲之饶。(《元和郡县志》卷十五、《太平寰宇记》卷四十五)”^④,“襄垣,邑带山林,茂松生焉。(《后汉书·郡国志》)”^⑤,可见魏晋时期,晋东南一带植被和生态环境都非常好。

2. 广征博引、悉心搜罗。佚文所出,除《史记》《后汉书》《水经注》《元和郡县志》《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寰宇通志》《永乐大典》《明一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等,还有成化《山西通志》及历代山西方志数百种,以及个人文集、碑刻资料。如依据《永乐大典》辑出的洪武《太原志》,不仅使这部志书能够完整再现,而且还“删去正文中增入的内容,重新依州县为序编排,恢复原书体例”^⑥。如从金代山西学者李俊民《庄靖集》中辑出的《泽州图记》,全书虽仅千余字,但对研究泽州及其属县历史极为重要。如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所辑明万历十九年(1591)蒋春芳纂《河东运司志》和清顺治十七年(1660)冯达道纂《重修河东运司志》,佚文都十分珍贵。此外,还以金皇统七年(1147)曹衍《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为线索,从《永乐大典》卷4650中,辑得《云中图》(辽以前)佚文1条。

3. 考述作者行状、叙志书流变。凡所收佚志,每书均有叙录,考证纂修者生平行状,叙述古志版本源流演变。如《赵记》条下所述:“李公绪撰。公绪,字穆叔,赵郡柏人(今河北隆尧)人。性聪敏,博通经传。魏末,任冀州司马,后以病去官。《北齐书》卷二十九有传。所著有《典言》十卷、《古今略记》二十卷、《赵记》十三卷等。”^⑦纂者生平简明清晰。如《方志图》条下所考:“此书《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云‘卷亡’。《宋史·艺文志》史部地理类有《方志图》二卷无撰人。《元一统志》、洪武《太原志》、成化《山西通志》均引此书,则此书明初犹存。其书或引作《方志图》《方志图经》。”^⑧古志著录、征引、存佚等情况犁然可见。

① 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前言》,第1页。

② 李裕民:《晋志钩沉·前言》,第1页。

③ 参见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第17—19页。

④ 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第381页。

⑤ 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第382页。

⑥ 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第29页。

⑦ 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第1页。

⑧ 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第9页。

4. 考证校订原书谬误。此书所辑佚文近 40 万字,辑佚已属不易,还对原书中的地名、山名、水名、人名、职官、年号、纪年、引文所出典籍等多有考证,对原文脱字、衍字作补充删订,对误书错字进行校改,全书共出校注 154 条。如“庞籍,至和二年,以昭德节度使检校太尉到任”^①。校记指出:“‘至和’原作‘至元’,据《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六《太子太保庞公墓志铭》改。”^②如洪武《太原志》太原县古迹门下,记故晋阳宫时引《史记》近百字。校记指出:“上述引文实出《韩非子·十过》,此作《史记》误。”^③

著名方志学者仓修良评价此书称:“无论是种类还是字数,都是迄今卷帙最大的古方志辑佚之书,对于古方志的辑佚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并进一步指出:“它的价值不仅在于为今天编修新志提供资料,而且对于研究方志发展史有重要价值。”^④

(二)《晋志钩沉》

此书是历代地理总志佚书中有关山西内容的辑录,收录 3 种类型:专门的地理总志,如《九州志》《十三州志》《括地志》等;非专著的地理总志,如《后汉郡国志》《晋书地道记》等;与地理总志性质接近的专著,如《古今地名》《匈奴须知》,或非专著如《地理风俗记》《博物志地理略》。全书共收录汉应劭《地理风俗记》,晋袁山松《后汉郡国志》,晋乐资《九州志》,晋张华《博物志地理略》,《晋太康地记》,晋王隐《晋书地道记》,晋戴祚《西征记》,南朝宋刘澄元《宋永初山川古今记》,后魏阚骃《十三州志》,陆恭之《后魏舆地图风土记》,南朝陈顾野王《舆地志》,乐彦《括地谱》,隋郎茂《隋州郡图经》,《古今地名》,唐李泰《括地志》,唐梁载言《十道志》,唐《开元三年十道图》,唐贾耽《郡国县道记》,《唐地志残卷》,唐韦澳《诸道山河地名要略》、《郡国志》,宋宋白《续通典》(州郡类),宋田纬《匈奴须知》,《金大定职方志》、《金人疆域图》,南宋范子长《皇朝郡县志》,《元一统志》27 种。《地图综要》虽然尚存,但颇为罕见,《四库全书》也未收入,所见山西有关资料较有价值,也作辑录。每书按时代排序,书名之下有叙录,略述书名、卷数、撰者姓名及生平、著录情况、佚文情况等。佚文末端括注出处,包括书名、卷次。书末附外编,有《山西古方志辑佚》补遗 32 种。

此书主要有如下特点和价值:

1. 采辑广泛。据各书叙录和佚文出处注,所涉历代典籍有《史记》《汉书》《后汉书》《水经注》《宋书》《史记正义》《史记集解》《史记索引》《后汉书注》《续汉书·郡国志注》《文选》《艺文类聚》《初学记》《唐六典》《元和郡县志》《古清凉传》《广韵注》《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路史》《通鉴地理通释》《诗地理考》《永乐大典》《寰宇通志》及《资治通鉴》(胡注)、成化《山西通志》、光绪《山西通志》等近 30 种,以及敦煌遗书残卷等。

2. 史料珍贵。唐韦澳《诸道山河地名要略》蔚州之“处分语”载:“兴唐郡北临朔漠,东接渔阳,并部咽喉,边亭襟带,宜多方控守,俾息难虞。”^⑤潞州之“处分语”载:“壶关势临燕赵,屏卫洛东,表里山河之固,实为朝廷重寄,卿宜勉弘口化以叶(金谐)。”^⑥这些“处分语”实际上是唐宣宗对两地形势的总体看法,以及战略上的部署安排,李裕民称“这为研究颇

① 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第 61 页。

② 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第 25 页。

③ 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第 99 页。

④ 仓修良:《方志学通论》,方志出版社,2003 年,第 543 页。

⑤ 李裕民:《晋志钩沉》,第 57 页。

⑥ 李裕民:《晋志钩沉》,第 59 页。

有作为的宣宗皇帝提供了第一手资料”^①。南宋范子长《皇朝郡县志》记载了宋代河东路所属太原府、代州、忻州、宪州、石州、晋州、潞州、辽州、隰州、平定军、晋宁军、保德军、岢岚军、威胜军的有关历史资料，涉及建置沿革、州境、风俗形势、山川、户口、古迹、人物等内容。李裕民云：“现存两种南宋志书（《纪胜》与《方輿胜览》）均不载河东路，故此书所载格外珍贵。”^②

3. 考述详悉。一是考证书名极为严谨。如《匈奴须知》叙录载：“《匈奴须知》一卷，‘田纬编，次录契丹地理官制’（《直郡书录解题》卷五），田纬系‘契丹归明人’（《文献通考·经籍考》引晁氏语），此书亦称《北鄙须知》（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九），其书元初犹存，后佚。”^③对作者、作者籍贯、书的异名，考述明晰，且每言必有依据。二是考流传、存佚甚为细致。如《开元三年十道图》叙录载：“《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以后各正史艺文志未收，则书佚已久。郑樵《通志》卷四《地理略》云：‘臣谨按唐《开元十道图》……载之《六典》，为可书也。’其下录《十道图》文，查开元间成书的《大唐六典》卷三，共记十道山川、贡赋，与《通志》所载同……由此可知，此书图已失，文则尚存，初被采入《大唐六典》，继被采入《通志·地理略》，世人未加注意，故以为全佚，而认定《元和志》为现存最早之地理书。”^④三是指陈前人辑佚得失颇为精当。如《括地志》叙录称此书“有王谟、孙星衍、王仁俊、曹元忠、贺次君辑本……贺辑本最晚出，较他本内容为多，错误较少，采辑之书凡二十三种。但其书尚有缺点：一、采辑之书不够多，如《古清凉传》《杨文公谈苑》《浮溪集》《方輿胜览》《雍录》《北户录》《永乐大典》《弘治保定郡志》《明一统志》《重修琴川志》《日下旧闻考》《苏诗合注》等均未征引。二、漏辑条目颇多……三、排列失当……四、抄辑内容有误……五、《史记正义》中有不少并未注明出自《括地志》者大量采入，内中固有可能属《括地志》文，亦可能为《正义》作者之语。”^⑤

二 旧志研究与整理

李裕民对山西旧志的研究和整理，主要包括旧志个案研究、旧志整理点校、山西旧志总况考述整理3个方面。

（一）旧志个案研究

其研究山西旧志，主要成果有《新发现的山西元代方志》《新发现的万历〈繁峙县志〉研究》《洪武〈太原志〉研究》《朔府志研究与整理》《光绪〈山西通志·经籍志〉订误》《〈平定县金石志〉著录的北朝石刻》《平陆县志考》等。他的研究往往以新发现的珍本或孤本旧志及旧志中有关经籍、金石内容为重点，从以下旧志研究可略见一斑。

1. 《泽州图记》和《河津县总图记》。《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山西现存最早的方志是明成化十一年（1475）刻印的《山西通志》，在华北地区，仅晚于正统十年（1445）刻印的《大名府志》。《晋阳学刊》1990年第4期刊登李裕民《新发现的山西元代方志》一文，对辑录山西古方志过程中发现的蒙古乃马真后元年（1242）《泽州图记》和元至正三年（1343）《河津

① 李裕民：《晋志钩沉》，第46页。

② 李裕民：《晋志钩沉》，第76页。

③ 李裕民：《晋志钩沉》，第75页。

④ 李裕民：《晋志钩沉》，第40页。

⑤ 李裕民：《晋志钩沉》，第17页。

县总图记》作了详细考证研究。

①提出“此二志的发现,将山西乃至华北现存方志的编撰时间提前了一二百年”^①。

②考述二志作者生平:“《泽州图记》,李俊民(1176—1260)撰。俊民字用章,号鹤鸣,泽州晋城人。金承安五年(1200)状元,任应奉翰林文字,不久,弃官返乡,教授生徒。”其著作有《庄靖集》传世。“《河津县总图记》,王思诚(1291—1351)撰。思诚字致道,兖州磁阳人。至治元年(1321)进士,授管州总管,至正二年(1342)累迁监察御史,出金河东宪……至正四年(1344)召为国子司业,官至礼部尚书、集贤侍讲学士。著有《致亭诗卷》,已佚。”

③考述二志收存情况:“《泽州图记》,收在《庄靖集》卷八中,成化《山西通志》卷二十亦全文收录,此志本有图,泽州守段正卿在编刻《庄靖集》时,未能收入,至为遗憾。”《河津县总图记》“保存于光绪《河津县志》卷十一《艺文》之中,从书名看,卷前应有图,惜已佚。”

④介绍二志记述范围和主要内容:“《泽州图记》所记范围为泽州及下属的晋城、阳城、端氏、高平、陵川、沁水六县……主要内容是四项:建置沿革、州名来历、四至和户口。”“(《河津县总图记》)全书未标门目,从内容看,实分14目,即建置沿革、户口、风俗、里至、坊乡、津渡、寺庙、古迹、山川、人物、名宦、赋税、土产、旌表。”

⑤评述二志特点和价值:《泽州图记》主要特点是引证史料多、“四至”记载详尽、户口资料价值尤高。《河津县总图记》主要价值有:户口数为正史和现存《河津县志》所不载,是古代河津县、户口数唯一记载;补充黄河变迁历史资料;记黄河和汾河渡口7处,是唯一可以考见的该县渡口资料;人物、名宦等所载资料可补史籍之缺。

2. 万历《繁峙县志》研究。20世纪90年代,山西繁峙县地方志办公室李宏如在该县光裕堡乡梁家庄张宣成家中发现抄本《繁峙县志》,遂寄李裕民并请研究点校。他反复研读,并与道光、光绪诸志以及《山西古方志辑佚》中所辑万历志细致比较,作校记数百条,并写成论文,发表在《明史研究》。其文主要对抄本概貌、版本鉴定、抄本价值和缺点作系统研究,于版本鉴定和抄本价值尤为详悉。

①通过对版本的研究鉴定,提出4点意见:第一,这一抄本不是万历《繁峙县志》的原稿,更不是万历刻本。第二,此本所抄万历志不是全帙,而是上半部。第三,抄本中清代内容为乾隆四十六年至四十九年(1781—1784)间所增,且仅有1条,可见不是整书重修。第四,此抄本不避清人之讳,应为民国时所抄。

②关于抄本资料价值。主要有5点:一是为现存繁峙县方志增添了新版本,且可纠正以往著录之误。他指出:“《千顷堂书目》卷6载‘高文登《繁峙县志》,万历丁亥修,令。’按:万历丁亥即万历十五年(1587), (查)道光、光绪诸志知繁峙从没有‘高文登’这个县令。‘高文登’应作‘涂云路’。”^②二是提供了新的人口变化资料。三是提供了经济史料。他称:“明代每隔十年左右都要清丈一次土地,土地按肥瘠分等,征收不同的税,但具体分多少等?各等间有多大差距?新清丈出额外土地如何征税?记载多不详细,而此志都提供了极详的材料。”^③四是反映了作者反迷信的思想。五是可补正道光《繁峙县志》脱误。

③在综合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结论:“此志应为民国初据清乾隆时有所增补的万历

① 李裕民:《新发现的山西元代方志》,《晋阳学刊》1990年第4期。以下关于此文论述均出此,不另注。

② 李裕民:《新发现的万历〈繁峙县志〉研究》,《明史研究》1992年2辑。

③ 李裕民:《新发现的万历〈繁峙县志〉研究》,《明史研究》1992年2辑。

《繁峙县志》手抄的，是海内外仅见的珍本、孤本，所记明事，尤有史料价值，许多内容出乎道光以后各本之外，值得我们的重视。”^①

3. 旧志经籍类和金石类研究。旧志经籍类和金石类均有目录学价值，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用，向为学界所重。余嘉锡尝谓：“治学之士，无不先窥目录以为津逮，较其他学术，尤为重要。”^② 李裕民曾就光绪《山西通志·经籍记》和民国《平定县金石考》作专门研究。

他在《光绪〈山西通志·经籍记〉订误》一文中考订出书名、作者籍贯、人名、出处4个方面27处错误。书名之误，如《经籍记》史部之载记类著录有《晋阳要录》1卷，宋太原王保衡撰。其按云：“《资治通鉴》卷292显德元年十一月《考异》云：‘河东刘氏有国，全无记录，惟其旧臣中书舍人、直翰林院王保衡归朝后所纂《晋阳伪署见闻要录》云……可知此书全名应为《晋阳伪署见闻要录》，《宋史·艺文志》简称为《晋阳见闻要录》，《经籍记》应著录书名全称，而不应杜撰简称。”作者籍贯之误，如经部之春秋类著录有：《公羊春秋注》，太原王接撰，见《晋书》本传。其按曰：“《晋书》卷51《王接传》云‘王接，字祖游，河东猗氏（今属临猗县）人。此作‘太原’，误。”人名之误，如经部之五经总类著录有《五经决录》宋太原王焕撰，《隋书·经籍志》著录。李裕民按称：“《隋书·经籍志》无王焕其人。”出处之误，如史部之传记类载：《甘陵诛叛录》一卷，唐王起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按谓：“《新唐书·艺文志》未著录，此应改为《宋史·艺文志》著录。”另外，还发现“以《经籍记》所载太原人的著作为例，书中共收164种……尚可补充140种”^③。

民国期间，《平定县志》编成后，因经费缺乏，未经刊刻，志稿遂流散。《平定县金石考》是该志的一部分，有幸流传至今，作者为平定县人蔡侗。李裕民研读之后，评价是书“优点有二，一是搜罗丰富，比《山右石刻丛编》所录平定37碑多3倍以上。二是体例较完善，每条下记碑的高、宽，字的行数，每行字数，书体，建碑年代，现存地点。已见著录者一一注明。对碑文大多有考证，考其内容，或引碑文，或引前人之说”^④。并从石刻类中辑出《北魏安禄交村人造像记》《东魏张法乐造像记》《东魏丰乐寺造像记》等13通北朝碑碣有关资料，为北朝史研究提供了新史料。

（二）旧志整理点校

早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方志编修的广泛开展，山西各地旧志整理也日渐开展，成绩固然有可喜之处，但也存在着质量不高的隐忧。在这样的背景下，李裕民“深感新出的旧志，在点校方志和质量上问题颇多，不妨动手整理一种，以资比较”^⑤。“以资比较”是其谦虚的说法，实际上是想为山西各地旧志整理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方法和示范。自此，他先后整理点校雍正《朔平府志》、明释镇澄《清凉山志》、康熙《宁乡县志》、万历《汾州府志》、天启《文水县志》、《山西民国乡镇志五种》、成化《山西通志》、万历《繁峙县志》、《安泽县志·岳阳县志合集》等14种旧志，还参与光绪《山西通志》整理，并负责该志《古迹考》点校。

尤为可贵的是，他整理旧志绝不止于断句点校。他以为，整理古籍如果仅仅标点一下，而不作校勘，里面的错误得不到纠正，价值会低很多。所以每经手一部旧志，除亲自断句标点，撰写

① 李裕民：《新发现的万历〈繁峙县志〉研究》，《明史研究》1992年2辑。

②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页。

③ 以上均见李裕民：《光绪〈山西通志·经籍记〉订误》，《山西地方志通讯》1985年第4期。

④ 李裕民：《〈平定县金石考〉著录的北朝石刻》，《北朝研究》1992年第2期。

⑤ 李裕民：《〈朔平府志〉的研究与整理》，《山西地方志》1989年第3期。

校勘记外，还对志书编纂源流、作者生平行状、刊刻版本、体例内容、优劣得失等给以全面详细的考评。

1. 考述志书编纂源流。康熙《宁乡县志》点校本序中对历代编修状况考述十分清晰：中阳曾三次修志，都称为《宁乡县志》。第一次是在明永乐十九年（1421）至正统六年（1441）间所修，《文渊阁书目》卷20新志著录。第二次是万历十五年（1587）到二十一年间，《千顷堂书目》著录云。第三次是康熙四十年至四十一年间，知县吕履恒邀易道人、王显晋等人同修。^①

2. 辨析纂修者及生平。他在整理点校万历《繁峙县志》时，据王垣序所云：“于是，礼属学博郝君、太学任君及弟子员张子、靳子、毕子诸生辈，朝夕从事，甫阅月，即授之剞劂”，以及涂云路序：“乃敦礼学博郝君、王君，属之总理，协以太学生任君暨张、靳、毕三庠友，开局于邑庠号舍，各秉公持正，逾月而稿成矣”。经过考证分析，得出结论：“按惯例应署（涂云路修），至于纂者即实际编写人则是任仲麟，张、靳、毕三人是其助手。郝、王二是人行行政负责人，主管经费、后勤、刻印等事宜。此书著录时应署涂云路修、任中麟纂。”^②

3. 分析志书刊刻及版本情况。他整理万历《汾州府志》前言指出：“此志的刊刻年代，《中国地方联合目录》作‘万历三十七年刻本’，这是有问题的。”^③又据是志卷七知府目之王道一条和刘一金条，仔细分析行格、字数、墨钉、补刻内容等，判断“此志应是万历四十一年或四十二年刻本”^④。

4. 评述志书史料价值。他整理明成化《山西通志》前言，指出其史料价值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提供了唐至明初许多珍贵文史资料。“如艺文门中所收王安石的《宋赠尚书都官郎中司马君墓表》《福岩寺碑谒并序》，《王文公文集》及《临川集》均未收录，墓表是王安石应司马光之请为其叔司马沂作的，由此可以看出，在王安石变法前两人友谊颇深，有的宋人笔记载王与司马等四人有‘嘉祐四友’之美称，看来是符合事实的。此墓表近年在夏县司马光陵园发现，足证成化志记载可靠，出土墓表已有残缺，可据此志补足。”二是成化志是研究山西地方史极为重要的资料。“如金元好问《创开滹沱渠堰记》、明代杜敦《新凿惠泽池记》、张昌《新修永利池记》《广孝泉记》，均为反映山西古代水利开发利用的重要资料。”三是是志有重要的辑佚价值。“书中保存最多的是山西方志，《山西古方志辑佚》一书中据此辑录九十九种佚志，计金元方志四种，明代府志一种，州志二十二种，县志七十二种。”^⑤

5. 指陈志书缺点和不足。他整理天启《文水县志》前言，充分肯定该志的优点：制定较为合理的凡例；对官员业绩记述评价客观；如实记述官府政策失当、官员执行偏差、豪强非法行径等。同时，也实事求是地指出：“天启志有其不足之处，主要是资料尚不够丰富，如有些重要的书就没有查阅，成化《山西通志》卷180《任延皓传》载其任文水县令时，大肆贪污，百姓准备上告，他先向汉高祖刘知远诬告县民企图造反，处死十多人，族诛他们的家族。这样典型的资

① 吕履恒等纂修，李裕民点校：康熙《宁乡县志》点校本“序”，康熙四十一年刻本，中阳县志编纂委员会，1995年8月内部印行。

② 李裕民：《万历〈繁峙县志〉研究》，万历《繁峙县志》点校本“序一”，李裕民点校，李宏如倡印：万历《繁峙县志》点校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页。

③ 李裕民：万历《汾州府志》点校本“前言”，李裕民、马夏民点校：万历《汾州府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页。

④ 李裕民：万历《汾州府志》点校本“前言”，李裕民、马夏民点校：万历《汾州府志》，第2页。

⑤ 李侃、胡谧纂修，山西省史志研究院：明成化《山西通志》点校本“前言”，第3—4页。

料,天启志没有采录,实是憾事。”^①

(三) 山西旧志总况研究与整理

李裕民是对山西旧志总况研究与整理的主要成果有《山西方志佚书考》《山西地方志综录》,以及《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山西卷主编)、《山西文献目提要》(副主编)。

《山西方志佚书考》是李裕民与刘纬毅合作写成的考述文章,收录在《山西地方志综录》附录中。文云:“经遍阅文献典籍,得知散失的方志多达三百二十九种,计:魏晋至唐十四种、宋代十九种、金元十一种、明代二百四十七种、清代三十五种、民国一种,其中留有佚文可见的二百(余)种。”^② 全书收录佚志 329 种,考录书名、卷数、作者,以及著录和征引情况,是研究山西已佚方志最全面、最系统的文章。

《山西方志综录》着重对山西现存方志概况、山西方志历史作出简要的研究和评述。一是勾勒山西现存方志总貌:“山西现存 1949 年前修的方志 458 种,约占全国方志数的二十分之一,居全国各省市第八位。”^③ 二是从时代划分、地区划分、级别划分几个角度,总结出山西方志的数量情况。三是归纳出山西方志的名称有史(《沃史》)、乘(《翼乘》)、记(《太原明仙峪记》)、图记(《泽州图记》)、要览(《左云要览》)、采访录(《平陆县志采访录》)、旧闻(《潞郡旧闻》)、纪要(《定襄纪要》)等。四是介绍山西方志体裁、版本方面的情况。五是从山西最早的方志《上党记》开始,叙述北朝、唐代、宋代、金代、蒙古和元、明代、清代、民国各个时期的修志发展历程。是文为了解和研究山西地方志的概貌和编修历史,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基本线索。

《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山西卷是金恩辉、胡述兆主编的《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中的一部分。1987 年,金恩辉、胡述兆邀请海峡两岸图书馆学、地方史志专家着手此书的筹划、组稿工作。“每一省,都推出一位或数位史志方面素有研究的资深学者,对本地区的方志遗产力求进行一种不漏的具体的考察、研究和评析,然后一志一条目地拟定成解题性、提要性的考评文章。”^④ 山西省的任务落在李裕民肩上。他除负责邀约撰稿专家和审订书稿外,还撰写《山西地方志述评》于山西卷端,对 1949 前编修的山西方志作出客观分析和评述。此外,他还亲自拟定了数百种志书提要。是书不仅对《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有关山西内容逐一核对、订正和补充,还对每种志书编纂沿革、版本源流、主要内容、史料价值、优劣得失等作详细考述。

《山西文献总目提要》由刘纬毅主编,李裕民为副主编。李裕民既协助主编组稿、审稿,又对著录体例和内容提出积极建议,倾注了大量心血。是书共收录山西方志 822 种,他亲自撰写出其中 120 余种提要。

三 新志编修的研究与指导

山西新方志编纂普遍开展之后,李裕民主要通过志稿评审、业务培训、志书评议等方式参与新志编修的研究与指导。从 1984 年 8 月在五台县召开的山西省县志初稿讨论会,到 2000 年第一

① 李裕民:《天启《文水县志·前言》,米世发等纂修,李裕民点校:天启《文水县志》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 5 页。

② 刘纬毅、李裕民:《山西方志佚书考》,祁明编:《山西地方志综录》,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6 年印刷,第 163 页。

③ 李裕民:《山西方志综录》,《沧桑》1995 年第 1 期。

④ 金恩辉、胡述兆:《〈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序》,《社会科学战线》1996 年第 4 期。

轮省编修基本完成,“十几年来,与曹振武、王伯华二先生走了几十个县市……志书中哪些部分容易出什么问题,清清楚楚,一抓就准”^①。他们3人各有侧重,分工明确,李裕民主要负责建置沿革、文物历史方面内容;王伯华是省教育学院教授,重点审读教育部类;曹振武在省地方志办公室工作,负责志书体例、文化和风俗内容。由于分工明确、配合默契、点评到位,他们深受市县地方志系统欢迎,被山西方志界称为志书评审“三驾马车”。早在1985年10月,李裕民就曾应邀为在祁县举办的山西省首届市县主编研究班授课,惜讲稿未能留存。他很少刻意地以空谈理论去说教修志人员,而是寓指导于评审之中,融评审、评议与修志指导于一炉。他对志书的评议能立足评议,而出乎单纯的评议之外,提出自己对新方志编修的看法和观点。他关于新编方志的论文,按发表时间先后,主要有《对〈山西煤炭志·概述〉的几点意见》(《山西地方志通讯》1983年第1期)、《对〈五台县志〉的几点意见》(《山西地方志通讯》1984年增刊)、《略谈修志的几个问题》(《文水县志通讯》1985年第6期)、《〈沁水县志〉订误》(《山西地方志》1988年第6期)、《〈山西山河志〉略评》(《山西日报》1995年9月6日)、《评〈南坳镇志〉》(《沧桑》1998年第6期)、《评〈晋城市志〉》(《沧桑》2000年第1期)、《〈运城市志〉读后》(《沧桑》2000年第2、3期合刊)、《略评〈山西大典〉——兼谈编写省情大典的几点想法》(《史志研究》2002年第2期)、《〈大同市志〉读后感》(《沧桑》2003年第6期)、《这是一部好村志——喜读〈理家庄村志〉》(《沧桑》2004年第5期)、《评论与建议——〈西山煤矿志〉读后》(《沧桑》2005年第6期)、《评〈洪洞县志〉》(《沧桑》2006年第3期)、《读〈贾村志〉——兼谈编写新村志的几点想法》(《沧桑》2008年专号)、《略论新方志编修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新方志理论与实践研讨会论文汇编》,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印刷)等。

他的主要学术意见概括起来包括志稿纠缪订误、资料搜集鉴别、人物记述方法、志稿修改加工、体例继承创新、突出地方特色、乡镇村志编写、对志评文章的看法等几个方面。

1. 纠缪订误。他学风一向朴实严谨,一丝不苟,指陈谬误单刀直入,一针见血,还能提出解决办法。如《对〈山西煤炭志·概述〉的几点意见》指出,书中有木炭与煤炭相混之误。“第十页引《史记·外戚世家》说:‘窦广国……入宜阳,为其主入山作炭。’按,古代单提‘炭’时,多指木炭,提‘石炭’‘煤灰’时才指煤。”^②又如《〈沁水县志〉订误》针对是志所载:“北魏时,端氏县曾一度(446—496)废置。复置后隶安平郡。同时北魏又于今城西30里另设东永安县,属泰宁郡”,指出:“‘废置’一词不妥,废是废除,置是设置,含义相反,不能合一。泰宁郡是孝昌中(525—528)所建,比安平郡要晚,不能同时。”^③其尝云:“治学应求精,研究历史,必须学会考据,离开这个基本功,研究社会就会变为空话大话。”^④若无扎实的考据之功,不进行细致比勘研究,根本无法纠正上述错误。

2. 资料搜集鉴别。他认为:“编好地方志,很重要一条,就是能不能将资料搜集完备。资料从大的方面分有两种,一种是文字资料,一种是口碑资料。”^⑤他主张历史资料一要查阅本地历代旧志,二要注意从历代总志中找,三要认真搜集碑刻资料,四要重视家谱和族谱。他还提出资料有真有假,须经过鉴别方可入志。并举出查阅历史典籍、借助历代碑刻等考订资料的

① 李裕民:《〈运城市志〉读后》,《沧桑》2000年第2、3期合刊。

② 李裕民:《对〈山西煤炭志·概述〉的几点意见》,《山西地方志通讯》1983年第1期。

③ 李裕民:《〈沁水县志〉订误》,《山西地方志》1988年第6期。

④ 李裕民:《成功的关键在毅力》,《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2期。

⑤ 李裕民:《略谈修志的几个问题》,《文县志通讯》1985年第6期。

实例。

3. 志稿修改加工。志稿修改加工关乎志书整体水平和质量。志稿评审后如何修改,他讲道:“应当将大家的意见梳梳辫子,先考虑体例问题,应增加什么,减少什么。”“体例确定后,应集中力量动大手术,先搞新增加的编、章、节。主编则需要将各编间重复内容加以砍削,还需要考虑同一内容放在哪一部分好?一处详谈,另一处就应当从略或不谈,各地的提法如何统一……材料不足的部分,应派人调查……尤其是序和凡例,应逐字逐句推敲。”^①

4. 体例继承与创新。编修志书既要继承前人修志的优长,又应在继承基础上合理创新。《晋城市志》在全志之末设“丛谭”卷,他认为:“收录文集、笔记、旧志中的有关本地遗闻佚事,既可广见闻,又可供研究。正文难收,弃之可惜。它既有可读性,亦有知识性。”^②《大同市志》在综述之后,设置有《大同市情表》。其中《13个较大城市市情比较表》详列1985年13个城市人口、土地、农业、工业、商业、科教文化等28项数据,既能彰显大同市优势,又可看出差距和不足。他因此称:“在纂修新志二十多年来,各志的体例已大致形成一种模式,要创新已相当困难,此表无疑是成功的创举。”^③

5. 突出地方特色。山西洪洞县移民文化在历史上极具影响。首轮修志中,编纂者为突出地方特色,在《洪洞县志》中专设“大槐树移民卷”,详细记载移民的历史背景、移民的组织、移民的流向、移出之后的境况等。他盛赞此卷是本书写得最有水平的一卷,并提出:“写好特色卷,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使全志大大增色。现在各地都在准备纂修续志,建议可以考虑吸取本志的优点,在特色卷上多下点工夫。”^④第二轮修志过程中,山西许多方志都在特色卷上进行积极探索,如《晋中市志》专设“晋商卷”,《平遥县志》专设“平遥古城卷”,《壶关县志》专设“太行大峪谷卷”,实践证明,他当时的提议是富有远见的。

6. 乡镇村志编写。他十分重视乡镇村志的价值,指出:“乡村志是乡村的百科全书,它记载了乡村的历史、地理、经济、教育、宗教、物产、名胜、人物等内容,资料翔实,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历史遗产。”^⑤他梳理并归纳出乡镇村志编纂的源流:“我国镇志的编写,大致可分两个阶段,古镇志始于南宋绍定三年(1230)修的《澉水志》(澉水,今浙江海盐县澉浦镇),兴盛于明清、民国,但和县志比较,始终没有形成固定的传统,数量不多。”^⑥他提出编好乡镇村志的办法:“村志怎么写才算是一部好志?能不能用市、县志的标准来衡量?我想,可以参考,不能照搬。”^⑦此外,他还提出资料运用和体例设置等方面的一些具体建议。

7. 人物记述方法。他对新方志中存在的“见物不见人”的问题十分重视,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新修的志书中,大概只有人物传能看到人的活动情况,其他部分几乎看不到。人物传规定生不立传,这做法没错,因为人是要变的,只有死了才能盖棺论定。旧志都遵循这个原则。但旧志还能反映一些生者的活动情况,在‘宦绩’栏中列出优秀地方官员的业绩。也有的在列任

① 李裕民:《对〈五台县志〉的几点意见》,《山西地方志通讯》1984年增刊。

② 李裕民:《评〈晋城市志〉》,《沧桑》2000年第1期。

③ 李裕民:《〈大同市志〉读后感》,《沧桑》2003年第6期。

④ 李裕民:《评〈洪洞县志〉》,《沧桑》2006年第3期。

⑤ 李裕民:《〈民国山西乡村志五种〉》,《山西文史资料》1997年第4期。

⑥ 李裕民:《略评〈南坳镇志〉》,《山西地方志》1998年第6期。

⑦ 李裕民:《这是一部好村志——喜读〈理家庄村志〉》,《沧桑》2004年第5期。

官员名录下附注其事迹。”^①他认为，修志的目的之一是为今人提供借鉴。新方志若不记人的活动、不述干部业绩、不分政绩优劣，便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

8. 对志评文章的看法。志书评议古已有之，历来都是方志学研究的重要方式。他认为：“书评很重要，它是学术发展的动力，优点可以发扬，缺点可以改进。书评可分两类，一是出版前的评审，二是出版后的评论。两者相比，前者更为重要，因为它有时间改进，有利于提高社会效益。出版后就不同了，错误一经指出，只能等再版修改，负面影响不易收回。就难度而言，也是前者难，它需要费精力查资料，以便作正式补充。”^②他还对当时方志书评存在的不良倾向进行批评，并提出自己对撰写书评的主张：“我爱写文章，但就怕写书评。时下溢美之风颇盛，我如直言优劣，有的人会不高兴，如一味叫好，与自己天性不合。”^③他认为：“书评既然署个人的名，应该有自己的个性，有一定的学术性，对志书的修改起些好作用，不应尽说捧场话。”^④

结 语

综上所述，李裕民在山西旧志辑佚、旧志整理与研究、新志编修和志书评议方面的成就，不仅对山西影响重大，对其他地方也有借鉴作用。期望有更多专家学者能如李裕民先生一样，与广大方志工作者形成合力，以做学问的精神参与到地方志研究和地方志编修之中。唯其如此，地方志事业方可健康发展，走向繁荣。

（作者单位：山西省地方志研究院）

本文责编：周 全

① 李裕民：《略论新方志编纂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新方志理论与实践研讨会论文汇编》，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2010年印刷，第23—24页。

② 李裕民：《〈运城市志〉读后》，《沧桑》2000年第2、3期合刊。

③ 李裕民：《评〈晋城市志〉》，《沧桑》2000年第1期。

④ 李裕民：《评〈洪洞县志〉》，《沧桑》2006年第3期。